



首次故宫海外展由军舰护送

1933 年，文物南运到上海本应告一段落，此时正好有人提案说要送到英国展览。这是故宫文物首次的海外展览。当时欧洲受到清末流出文物的刺激，兴起一股中国艺术风潮。英国、法国、北欧等地商人纷纷开店，王公贵族竞相购买中国的陶瓷器。其中有些收藏家发起提议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并向伦敦的驻英大使馆提出了故宫收藏品的出展邀请。这在国民政府内引起了众多议论。虽然有赞成者认为：“这是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但也有反对者担心：“如果在海上遇到事故或海盗怎么办！”另外因为国民政府向英国借贷高额借款，也有人担心故宫文物会被扣押。

最后是积极派坚持，提出使用英国军舰运送及故宫专家装箱护送的条件，英国方面表示同意。此间还曾经留下这样的传说，当时英国主办方曾问过莱斯保险公司的保险金额，结果对方回答：“超出本公司的能力”，不愿承保。英国方面很高兴

用军舰运送，于是英国海军巡洋舰萨福克号从香港到了上海。此次英国展览的准备委员会召集人，由两国元首——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展览，拉高至两国政府的层级。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曾任国际联盟中国东北调查团团长的李顿爵士担任。展示作品也有来自英、法、德、美等收藏的中国艺术品。故宫的七百三十五件及其他博物馆挑选出共计一千多件，在 1935 年 6 月运抵英国。那志良等四名故宫职员并未搭乘萨福克号，而是从上海搭客轮前往英国。11 月起故宫文物展开为期 14 周的故宫英国展览，受到极大的好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向西再向西的文物大迁徙

从伦敦和文物一起回到中国的 那志良，紧接着又开始忙着把文物从上海搬到南京。南京的“朝天宫”是明代的宫殿，当局决定在此设置南京分院。当时已用最年钢的钢筋混凝土建好三层楼的文物仓库，该仓库装有换气及温度调节设备，还有地下仓库作为紧急避难之用，不怕炮弹攻击，是个非常适合保管故宫文物的场所。

当这些离开北京、辗转一千七百公里、历经三年流浪期的文物，正准备好要搬进去时，发生了震惊全中国的大事，那就是卢沟桥事变。8 月发生了淞沪会战，江南一带情势极度紧迫，日军攻击首都南京的危险日增，文物必须再度搬迁。从北京

南下的文物，这次不得不向西运送。这个阶段称为“西迁”，主要分为三条路线。曾运到英国展出的故宫精华文物八十箱，8 月时首先被运送到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那志良等人搭船从长江逆流而上到湖北省汉口（武汉），再走陆路进入长沙。从南京一起运到长沙的还包括政府重要文件。不过当时大部分的文物还放在南京的仓库，随着战况愈来愈愈吃紧，高层下达了文物全部疏散的命令。人在长沙的那志良接到要他赶回南京的急电。第一批送到长沙的八十箱文物也要继续往西送，并被分为两个部分。

第二批文物在 1937 年 12 月上旬走水路从南京被运到汉口，运抵汉口的文物有九千三百三十一箱。第三批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是走陆路，到西安西边的陕西省宝鸡。南京是在 12 月 13 日被攻陷，所以可谓是无千钧一发。事实上运到汉口或宝鸡都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搭乘的火车或船舶正好行经这些地方而已。情况危急，几乎没有有什么准备的时间，在战乱时要疏散大量文物的困难可想而知。七千二百八十八箱走陆路到宝鸡的文物，被安置在城隍庙和关帝庙两处。从宝鸡往东走就是大城市西安，而且不知道何时会变成日军的攻击目标。那志良负责护送陆路的文物，由于担心文物的安全，他将文物运到离西安更远的陕西省汉中郊外的宗营镇。虽然是战时，但那志良还是设法让地方政府调来二十台搬运用的卡车，将文物从宝鸡往宗营镇接连不断地运

送。但是正逢冬季气候不佳，输送队伍常因大雪而无法动弹。由于走的是山间小路，人烟稀少，缺乏粮食，护送的人都已做好在半途殉职的准备。运送过程本身的艰辛也就罢了，身后还有一路向西的日军追兵，文物也就被逼着一路往西再往西。

长沙的八十箱文物被运到贵阳，再被送到离贵阳约一百公里远的安顺洞窟。走水路到汉口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被运往四川重庆，走陆路到宝鸡的七千二百八十八箱则经过汉中郊外再被送到四川成都。汉口被日军攻击，重庆也危在旦夕，重庆的文物只得再往西迁到乐山，成都的文物则再往西迁到峨眉，每条路线都是马不停蹄。紧急的避难行动和日中战争展开的节奏完全一致。重庆的文物从长江逆流而上来到长江支流的岷江，再运至乐山，而成都的文物都走陆路。那志良在成都每天奔忙于指挥运送、分配卡车及捆装文物。

当时所有的文物都处于“千钧一发”的险境，那志良回想道：“最后一卡车从成都出发不久，日军的战斗机就到了成都上空，炸毁机场。天气晴朗，日本空袭机组飞得很高。”从成都到峨眉直线距离超过一百五十公里，但是道路崎岖险峻，载着文件的卡车也曾经半路跌落到小河里，幸好文件都没有被损坏。那志良说：这是一条最艰辛的道路，而且还要烦恼没东西吃。运送到峨眉的工作告一段落，那志良就被派去负责重庆到乐山的运送。护送队伍人手严重不足，本来随文物疏散的故宫专门人员就只有十多人，其中熟稔

文物种类及捆装技术的更少。那志良等职员可说是过着不眠不休的日子。那志良诉说搬运文物的辛苦之中，最苦的是“调度粮食特别困难”。在四川省想找米饭，就只有夹杂着砂和稻壳的灰色东西。

在文物疏散的最后阶段，还有更加危险的事情正等着那志良他们。走水路的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文物运抵乐山郊外的安吉乡，但因为河面很窄，必须从岸边逆流拉纤引小木船向上。一次那志良等搭乘的小船遇到急流，与船相连的绳索断裂，船被卷入急流之中，所幸船没有翻覆搁浅，人命和文物都没有损失。为了保护文物，卡车都行驶得很慢，因此一百公里的路程有时要走上半天或整整一天，道路塌陷、轮胎脱落也是常有的事。即使走水路，分散于各小船的文物也经常遇到危险。不过虽然如此，这些文物在运送途中几乎没有遇到破损或遗失。从北京出发，历遍超乎常人能够忍受的困难，坚持护送文物的那志良等故宫职员，在这个过程秉持着一个信仰就是——“文物有灵”。到现在故宫仍传承着这句话，不难想象，故宫职员在守护国宝度过每个危机的一瞬间，脑海里会自然涌出这句话。文物疏散工程结束后，那志良在峨眉的保管场与文物共同生活了七年。日军的攻击始终未到达峨眉或乐山，那志良等人得以暂且过着安宁的日子。1945 年日本投降，1947 年文物全数回到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分院。（摘自《两个故宫的离合》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18.和日本人作斗争

这回成了正儿八经的教友，一切也得正儿八经地按规矩办事。入教堂望弥撒得跪着，膝盖很痛。还得去“告解”，神父坐在小龛里，我跪到他侧边，隔着一扇有网板的小窗向神父坦白自己的罪过。之后，神父让我念多少遍经赎罪才算完毕。可我不喜欢告解，向一个陌生人说“隐私”总是挺紧张的。再者，每次都是说“我没听话，我打人了，还骂人了”，想不出什么新鲜词，怕神父斥我为屡犯不改，压力不小。告了解就可以领圣体，跪到祭台前，张开嘴，由做弥撒的神父放一枚硬币大小的干面片在我舌头上，我就回到原来的跪板上。干面片一会儿就化了，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就像我入了教一样，一点儿味道也没尝出来。

楼下梭特的厨师去集中营与梭特办过交代后就离开他家走了，房子空了一两天就住进来几个日本男人。自此，我们就不再在院子里逗留。战前西边的那幢楼就有了裂缝，用木杆子撑着，没有人住，那日本人在这里跟没有邻居一样。有时候他家有来客，送客走时，主人在门外，把腰弯个 90 度。每送走一个，他就点一下头，直到走光了才直腰。我从窗户朝下看，心想跟朋友敬礼还讨巧偷懒，不是好人。有时候还来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木屐，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叽叽嘎嘎地笑着，发现我在看她们，就向我招手。我赶快走开，不理日本婆。

我哥哥上华仁书院，有日文课，同学们都不学，在底下玩，说话，吵。老师也明白，干脆站在教室门口去望风，见日本人或校长过来，大家就坐好，装出上课的样子。哥哥说，这也是抗日斗争。

我们走在路上，要注意前面有没有岗哨，若有便绕小路越过，不给日本兵敬礼。有时路上还有搜身的，特别在公共汽车和电车站上多。我们就夹紧胳膊弯着腰，说怕痒痒，笑着跑过去。搜身的看我们是小孩儿，也就



算了。

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粮食都只供应那么一点点，食油、副食根本就没有。蔡爱礼夫人常叫我哥哥去她家吃饭，因为她家经常有肉吃。我们也在她家和她的三个孩子玩。那时蔡家已搬到卫生课的楼顶层，再上面就是 11 层楼的顶棚，地方大，视野也宽，也吵不到别人，成了我们五个孩子的乐园。那天，日本人庆祝攻陷新加坡，弄了一群人在汇丰银行前面耍狮子、舞龙。我们从上往下看得很清楚，齐声向下骂着“汉奸”“汉奸”！没人听见，自然也没人理我们。后来，蔡家的女佣拿来五个面饼，说是日本人散发的。这种甜面饼，战前我们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也算是一种美餐了。圆饼中间是个红疤，日本的国徽。哥哥带头，先把那红疤抠下来，说是“消灭小日本”。我们也学样子，把红疤放在口中使劲儿嚼，颇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气概。

香港人不堪日本的统治，日本人也维持不了这一百六十多万人的香港，回内地的人很多。人走得多了，一方面日本人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大量搜刮民财。凡是上船的，担子、行李都得打开让他们搜，好东西，他们就要了；看不顺眼的，或有怀疑的，就顺手扔进大海。

我们在香港没有基业，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也不愿过这种亡国奴的日子，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未可测，所以妈妈决定我们也走，回内地。回内地不是回老家，若让日本人搜掠只剩下铺盖和换洗衣服，也是不易生活的。还是蔡医生帮助，介绍了一个管交通的日本大佐，只要送他几幅国画、字，他就让我们免受检查。

那天，日本大佐来选画，我和哥哥二人在旁努目而视。妈妈推我们下楼去玩，我们就下去坐在门口台阶上。大佐的日本司机是个小伙儿，坐在门外汽车里，看见我们就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摇摇头，他就下车走了过来，还拿出糖来给我们，一边比画着，说他家有弟弟、妹妹，和我们差不多大。看我们不接他的糖，就把糖纸剥开再给，表示诚意。糖并不高级，糖纸上印的连环画。

4.袁朴生看上一个女人了

古蜀街上还有一处景致，便是天主教堂。早年有一位保罗神甫在此传道，他是葡萄牙人，也是个壶迷。壶手陶工里，受神甫影响，渐渐也有信天主教的。后来那保罗回国办什么事去了，竟一去不返。说是在海上翻船了。那教堂便渐渐成了一具躯壳，拆又不便拆，里面住了些无家可归的佣工贩夫之类，亦是古蜀街一景。

袁朴生大病痊愈，即去蜀山三娘娘庙烧了高香、捐了银子。且无声不响做下一件大事，以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古南街风箱巷买下一栋带天井的旧宅子。告别了自己住了八年的窑头小屋。他的人生仿佛要重新开始，之前的一切都和那场病一起了结。搬出那间阴暗的小屋的时候，袁朴生不免有些留恋。八年的光阴，将窑头小屋的每一寸空间都撑得满满。他从古蜀街上走过去，迎着那些劈面而来的目光，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他才 26 岁，一个外乡人，也没有拜什么码头，认什么师傅。凭着手巧、勤恳，平时声色不露，居然把一坨紫砂泥做得风生水起，他的壶，不光在古蜀街有名，就是上海、无锡这样的大码头，都有人来订货。古蜀街上历代出了不少制壶的名师，但家境大抵窘迫。许多艺人做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在窑头小屋内寿终正寝。特别是牙医古子樱居然拜袁朴生为师，这件事让镇上人不但看着新鲜，也衍生出些难以理喻的疑问。那古子樱自从拜了袁朴生为师，半天在诊所行医，半天跟着袁朴生学做壶，两人走在街上，就成了古蜀街上独特的一景。

一个单身的壶手，无牵无挂的，突然置下一栋宅子，只有古子樱知道，袁朴生为什么要这样做。袁朴生看上一个女人了。有天晚上，古子樱跟着袁朴生去城隍庙看滩簧戏。他们刚坐下，袁朴生一眨眼不见了。直到戏台上的帷幕拉开，袁朴生才脸色发亮地回到座位上。古子樱发现，袁朴生的眼睛一直盯着戏台上的花旦看，那种执着得近乎痴迷的表情，让古子樱好生奇怪。他几次跟袁师傅搭话，他却一句也没听见。滩簧戏是本地风情之一，其曲调清醇温润、悠扬柔绵，一如本地酿制的“缸绵清”米酒；

无论达官贵人、草民百姓，都能哼上几句。窑场上的人都知道，袁朴生最爱看滩簧戏，平时做壶做得顺手，也喜欢哼几句。他最喜欢的，就是本地“雪琴班”剧社的当家花旦莫水蓉的戏。雪琴班在江南一带巡演，为了看一出莫水蓉的戏，袁朴生就是跑个几十里地也不嫌累。那天看完戏已经很晚，古子樱本来想请袁师傅去北街刘麻子馄饨店吃点消夜，可是袁师傅又不见了。古子樱很好奇，他找了半天，终于在南街画

溪桥畔的古柳树下见到了袁师傅。淡淡的月光下，他正和一个身材姣好的女子在树影里私语。那女子面容桃花，古子樱眼熟得很，正是戏台上的当红名角莫水蓉。

那莫水蓉戏演得好，人也确实漂亮。据说，方圆几十里追捧她的戏迷很多。但在古子樱看来，那个女子纵然有着天姿绝色之貌，却也有着一脸的是悲。窑场上的女人提起她，谁都会说出一串故事。说她有个名叫汪一轩的老公，原是雪琴班的首席琴师，那胡琴，拉得可是一绝，号称江南第一琴呢。但不知什么时候，汪一轩染上了大烟瘾。人瘦得像只猴子，人又称汪猴子。有一回雪琴班在常熟演戏，那汪猴子突然就失踪了，有人说他烟瘾发作，掉进了河里，却又不死尸；也有人说他跑到上海一家大烟馆里去混了。

汪猴子生死不明，让莫水蓉怎么做入呢？自古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些男人沾不上莫水蓉，就给她泼脏水，编排故事。你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据说莫水蓉和汪猴子还有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在乡下娘家养着。莫水蓉还有个妹子，名叫莫水仙；相貌不比水蓉差，原先也唱戏，后来被一个富豪包养起来，没出几年，那富豪病死了，倒是留下些家产，那莫水仙便开了一家伶舍客栈，有些水路旱路的客人见她有几分类色，便打她主意。江湖上说起这个女人，总与风月沾边。据说，莫水蓉与这个妹子并不热络，但妹子的故事，七缠八缠，常常变成了阿姐的传说。莫氏姊妹便成了江湖玩客们下酒的一碟好菜。

那样的女人，古子樱觉得袁师傅没必要去插上一脚。他应该找一个普通的贤惠女子成家，过一份安稳的日子。

国壶

徐风

